

目 录

- 一、谈《乐昌政报》梁伯彦（ 1 ）
- 二、抗战后期的一七七医院
.....陈 劲 何 桃（ 4 ）
- 三、乐昌抗日时期杂忆梁伯彦（ 14 ）
- 四、抗战时期坪石的一场反限价斗争
.....廖治金（ 20 ）
- 五、南岭煤矿的春秋刘玉祥（ 22 ）
- 六、乐昌邮政通信事业发展概况
.....包祥应 李荣谦 杨先炎（ 28 ）
- 七、梅花中学的回忆
.....陈翼亚口述 廖炳煜整理 杨民生补充（ 37 ）
- 八、旧社会乐昌的典当业
.....《乐昌县金融志》编写小组（ 40 ）
- 九、武江今昔琐谈张继骅（ 45 ）
- 十、民国各时期的乐昌县参议员
.....赖 东（ 49 ）

- 十一、解放前夕南岭煤矿的护矿斗争.....
.....刘玉祥 (51)
- 十二、解放前夕的乐昌县警察局.....
.....张 洪 (55)
- 十三、三亿多元“国币”为何付之一炬.....
.....甘锡军 (58)
- 十四、解放乐昌记实.....张 艺 (60)
- 十五、平息土匪暴乱 保卫新生政权.....
.....朱子辉口述 邓贯然记录 (65)
- 十六、坚不可摧的盾牌.....朱逸之 (70)
- 十七、抗击土匪暴乱亲历记.....
.....毛 必口述 邓贯然记录 (72)
- 十八、生擒土匪杨亚牛.....
.....龚衍瑞 丁 伟 (77)
- 十九、薛岳轶事.....陈家辉 (80)
- 二十、亲睹薛岳回乡之行.....王斯德 (82)
- 二十一、乐昌洸口的赵佗城.....韦 文 (84)

谈《乐昌政报》

梁伯彦

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三年夏，梁汉耀出任乐昌县长。在他的任期内，乐昌县曾出现过一份《乐昌政报》。当时乐昌不仅没有日报，连什么刊物都没有，《乐昌政报》的出版，可以说是当时乐昌唯一的一份刊物了。

《乐昌政报》大约是在一九四〇年创刊的，最初每一个月出一期，不久改为半月一期，采用四开报纸形式，分成四个版面：第一版刊登省府和各厅、处发下的带有公开性质的文件、政策、措施、各项规定，具有不另行文的效力，间中登上一篇社论；第二版刊登本县政治动态，由县各部门和县府各科室提供稿件；第三版登载各区乡来稿和社论新闻；第四版是副刊，选登业余作者和县属中、小学师生的作品。

主编这份刊物的是丘峰，字仲琛，广东龙门县人，他曾任县战时动员委员会的秘书。听说是经过省战时动员委员会培训过派来乐昌担任此职的。在梁汉耀未到乐昌之前，他已到乐昌。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内单位的主管及当地士绅一大批为委员，日常工作由秘书一人负责，属下有一个战时工作队，队员二十多人，经常下乡搞宣传抗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未出《乐昌政报》之前，该会原有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刊物叫《乐昌战报》，梁汉耀到乐昌半年以后，把它改

名为《乐昌政报》，亲自书写报名刻印在报纸上面，采用铅印，每期五百份，由县府拨付经费，使出版有了保证。梁汉耀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物，认为办好这份报纸与他的政治前途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份报纸除发给县属区、乡直至保长以外，还上报省府各厅、处和分送省内各县、市，影响较广，故对此甚为重视，往往亲自过问，有时还自撰社论交该报发表。

梁汉耀又是个具有政治手腕的人物。他未来乐昌之前，已担任过德庆、灵山两县的县长，积累了一些办政经验。他每年必组成县政督导团下乡两次，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各一次。设总团一个，分团四个，总团长由他挂帅，配备一些精干人员选点下乡，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派出四个分团，由县国民兵团副团长、税捐征收处副主任、田粮管理处副处长和县府科长担任分团长，配备职员、军警十多人，一般下乡一个多月，具体任务有三：（一）宣传布置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催税、催粮、催兵等；（二）就地商量解决当地的存在问题；（三）搜集情况，发现问题，向上反映。督导团未出发之前，政报即大吹大擂，报道组团名单，督导范围，所抓重点工作，发表声色俱厉的社论，大有雷厉风行、兴利除弊的架势。在督导过程中和收队返县后，又连篇累牍地报道订立措施、建立制度和工作成绩等等，因此曾得到省府的关注与表扬，号召其他县市向乐昌学习。

那时我在乐昌县政府工作，亦常常为该报写稿，多数为文艺作品，如读书笔记，读史随笔之类刊在副刊上面。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是记忆最深的：一件是有关乐昌禁娼的事。梁汉耀未到乐昌之前，即前任县长李某任内，乐昌县城和坪石镇不止暗娼流行，而且公开向娼妓发牌，由县税捐处

收税，名之曰“花捐”，县政府职员的工资有四分之一要靠花捐收入来维持。（你看可笑不可笑？）县府附近有一条小巷叫小溪街，里面就住着数十娼户，大都是湖南籍的女子，门口挂一块彩色花布门帘，客厅有二胡伴唱，再入则是藏垢纳污之所。每当华灯初上，其门若市。有一次，省府主席李汉魂的夫人吴菊芳为了采购建筑省立教院的校舍需用大量的竹木材料前来乐昌，得知此事，便以妇女领袖维护妇女权益为名向梁汉耀当面提出禁娼的建议。梁汉耀与有关人员几经磋商，权衡利害，遂决定实行禁娼。政报为此大作宣传，邱仲琛通知我写一篇社论，我记得那篇社论的题目是：《小溪街应改名中原路》，副题是《一个适时的建议》全文一千多字，赞扬梁汉耀禁娼业绩。因为梁汉耀别名中原，这完全是为梁汉耀个人捧场而写的。事后县警察局果然将小溪街改名为中原路，流行了一段时间。梁汉耀离开乐昌以后有无变动，我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件是有关抗战形势的事。一九四二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内出现一股分裂倒退妥协投降的暗流，我写了一篇《切实提高战意》的一千多字的论文，以“澄影”笔名在该报第一版上发表，两个月后，我发现阳春县政府出版的《阳春周报》全文转载，仍署作者“澄影”。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给我很大的鼓励。由此可见《乐昌政报》对省内各县市起到一定的交流作用。

梁汉耀为了《乐昌政报》能够按期出版，是煞费苦心的。那时乐昌印刷条件很差，送到韶关去印，又往往不能依期印好，拖延十天八天视为常事，且错漏百出，伤透脑筋。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送去湖南耒阳印刷的。因为梁汉耀有一个同学在耒阳开办了一间规模较大的印刷厂，（下转第13页）

抗战后期的一七七医院

陈 劲 何 桃

抗日期间，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和其他单位迁来乐昌者不少，仅医院就有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暂八师医院和军政部第七战区一七七（后改为陆军第八十三）后方医院（下简称一七七医院）。现谈谈一七七医院一九四二年后的情况。

一七七医院是间专门收容国民党军队伤、病员的战区后方医院。医院通讯用军邮“适字二十五号信箱”为代号。

医院设在油桶街（现先锋街）的楚南会馆，仁和街（现先锋街）的广同会馆，河南街的江西会馆，沙堤市（现先锋街）的华光庙等四处。楚南会馆用作医院办公，内用木板、竹篾隔开，分成院长、荣军管理、政训、医务、军需、药房、书记等几个办公室；入门后的门楼上住着医院内仅有的两名女性工作人员，并设一间电话值班室；门口有手持武器士兵站岗放哨。广同、江西两会馆用作收容伤、病员治疗。广同会馆正厅用作每周全体院员参加纪念周活动外，所有厅房都架着一排排用条凳、木板、白布铺的病床，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每两张病床背靠背地连在一起；门口没有岗哨，出

入自由。华光庙未派固定用场，一般只作文娱活动场所，有时也住伤、病员。

医院的管理体制成“三权鼎立”，即院长、荣军管理员（战区荣军管理处派驻）、政训主任划分职权管理。院长一名，上校军阶，总揽院政、医务大权；荣军管理员一名，中校军阶，专管伤、病员生活动态、组织纪律；政训主任一名，中校军阶，专管伤、病员政治思想，教育学习。医院以医务人员最多。一九四二年后的人员情况是：院长下设医务主任，中校军阶，下属有处方权的军医助十多二十人，看护四、五十人，护理员六、七十人，每病区有伤、病员五、六十人，看护二至三人，护理员四人。此外，尚有少校药房主任、上尉书记、上尉军需、少尉特务长各一名，司书、文书、军士、勤务兵各若干名，守卫办公室用一个武装班；荣军管理员和政训主任下各设一名干事。人员中除二名名为助产士而又无产可助、实际为看护的女性外，均为男性工作人员。

医院还有个小型粤剧团，演员和乐手全为男性，共约二、三十人。一个扮花旦和一个扮小生的主要演员挂中尉衔。时而在华光庙演出救亡宣传或传统性粤剧，为伤、病员服务，也对外卖票给百姓看。戏班人马临时凑合，并非长驻，愿意在医院作演员时医院发给工资，要离去也自由随便。

二

一七七医院的伤、病员来源，是由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分配。收容数一般为六、七百人，伤、病员运送大部分来自

陆路的火车，少数来自水路的船舶。来前总监部先用电话通知医院派人去接，由于医院没有车子，每批伤、病员到达车站或码头后，能走路的自行走路到医院，不能走动的则预先准备好担架抬。来就医的伤员比病员多，主要是营级以下的官兵。那时虽是国难当头，但团级以上的军官伤、病，大都有条件住入舒适的设备较好的药物较齐的医院。营级军官来就医的也很少，偶尔来一名，便安排去住名为“长官房”的单身病室。伤、病员中以广东（尤其下四府）人最多，其次为广西人，还有部分云南、四川等省人。伤、病员入院后，每人发给胸前印有红十字符号的白色布料病服两套，冬天加件蓝色棉衣，还有蚊帐、被盖、碗、筷等用品。

一七七医院所用药物，亦由总监部拨给，其设备和药物质量都很差。医院只有平常很少用的显微镜及种类不多的一般外科手术器械，而日常用的镊子也没有，将筷子破开两边，在裂开那端各边缠上胶布以代用。一些较复杂的化验无法进行，军医开药，凭临床经验和对伤、病情的印象。药品大约有消炎、退热止痛、帮助消化、止疟、止痢及外科药品、敷料等二百种左右。抗战期间药品来源困难，导致有些药物被人做了手脚，或将值钱的卖了，然后买回低下的廉价药品。稀有的黄胺、呋苏、呋咭则被列为药房的名贵药。那时，疟疾很多，常用的见连丸是溶结成团的，无法分成颗粒，便按原瓶数量和所含分量冲一定倍数的开水溶解，用时用量杯再分药液。有时得到慰劳品美国援助的阿洛平，就如获至宝。

伤、病员的每日用药，液剂没瓶子装，用个土碗盛着放在床头，护理员口头交待碗内药水分多少次服完便算。片（丸）剂没个药袋。名为后方医院，条件却非常简单和粗

陋。

但一些医务人员面对恶劣环境，还是勇于克服困难，尽力去做工作，同仇敌忾，作好伤、病员的护理，注意搞好环境卫生，在可能内寻找医疗上的代用品。时有人到伤、病房内作救亡为内容的讲话，教唱抗日歌曲，出壁报，编话剧，鼓励伤、病员以抗日大义精神，刻苦忍耐，配合治疗，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为民族争光。每月都有人数不等的伤、病员治愈出院回到军队里去。

一九四四年夏季，国际红十字会曾派来一个有五、六名成员的匈牙利医疗队，住在华光庙，帮助医治骨科和截肢手术，医技不错，态度也好，并带来了部分药品。工作了四个月左右，帮助解决了一些医疗难度较大的问题，给伤、病员和医院人员留下了好印象。

三

战时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一七七医院的人，生活很艰苦，饷粮（工资）不高，上尉军医每月饷银七十多元（国币，下同），少校九十多元，中校一百一十多元，上校一百三十多元。在一段时间里，虽有时断时续的廉价糙米每人每月配给几十斤，但从院长到护理员，就凭那点微薄饷粮去解决全家当时市面上一斤米就要一元的高生活水平，真是捉襟见肘。加之又经常遇到压饷（不能按期发饷），不少人逼于常去追问应领未领到的饷粮，特务长便说：“大家都难呵！这样吧，借少数钱去先用着啦！”以至有些经济负担较重的便常诉断炊之苦。

大部分院员生活难以为计，致使医务主任去乐昌中学兼

课，有的军医跑去替老百姓看病，与人搭挡做生意，个别还秘密聚赌渔利。这些现象，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期墙报出现一幅讽刺漫画，画了一个军医，手挟皮包，奔驰在道，满头大汗，傍文提问：“此公来去匆匆，为公乎？为私乎？”但也有少数秉性刚直，一心致力于救亡大义的。如医务主任刘觉先，一家五口，一妻二子一女俱待抚养，境况艰难，其妻迫于家计，沿街叫卖松糕，虽屡遭同仁讽刺，说他本有生财之道，却不去走，是真正的傻瓜，刘亦坦然置之，始终不去找“外块”。

医院的人生活固然艰苦，但伤、病员的生活则更苦。伤、病员的膳食，规定每餐二毫（角），统一由医院的伤、病员饭堂办理，质量很差，谈不上提供些什么营养，只能不饿肚皮。一日两餐，上午十一点，下午五点。开饭时，分菜不分饭，每人一份青菜加上风吹得起的几片肉，糙米饭用箩盛着自己去装。有些伤、病员胃口不好，端着饭碗，无法下咽，时闻伤、病员房内砸碗摔筷和骂娘的声响。医院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砸破了碗，只好重新送上一套，当管理干事的到来婉言劝解几句，下顿开饭，质量依然。

伤、病员住院，经济待遇有别：伤员住院期间，照原军阶待遇按月发饷钱，另津贴伙食（住院吃饭不交钱）；病员住院期间，则取消原饷薪，只给膳食和每月发给二、三元生活费。那时的二、三元，实在买不到多少东西，有抽烟嗜好的常因“无米（烟）可炊”而向别人伸手。

伤、病员的伙食既差，市场上又百物昂贵，为了填补那枯竭的生活，有些受不起物质引诱又能活动的人，便不理医院的规定，私行外出，去与人合本做点小买卖，到处游逛，窥测可变钱的门路，到倒塌的废圩墙脚下去挖点废铜烂铁，

以至聚众赌钱、偷盗。

四

一七七医院处在后方，在一定的时间里院情稳定。每年，战区兵站总监部派人来视察，发现问题，便要追查，还将全部院员集合到楚南会馆侧边操场上，逐个点名，防食虚额，但医院每年都能顺利过关。对于伤、病员也年中另有一套人马前来查管，可伤、病员却不吃那一套，而时有闹剧发生。

伤、病员中，广东籍的自恃人多，对外省籍的开口就说“赵（嚼）个帮捞（老）头”，加之一些伤兵头（老伤号）在内搞鬼操纵，聚众闹事几成习惯，他们以一副“亡命之徒”的嘴脸，自命“有功”，天不怕，地不怕，发展到每天晚饭后便成群结队到太平街或大菜园下边的武江河侧沙滩上赌番摊、推牌九。

那时乐昌县长梁汉耀，明令禁赌。得知一七七医院的伤、病员，每晚点起煤油灯在众目睽睽之下违禁聚赌，无视堂堂的“七品正衙”。于是首先致意医院禁止，医院对伤、病员虽作劝说，可是那些赌徒根本听不进去，依然到沙滩“拼搏”。县长见“文”的不行，便要用“武”，想到宪兵是国民党军队的“兵王”，何不请来作“镇邪的灵符”？！便与驻乐昌宪兵队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县政府派出巡查队时宪兵去人协助捉赌。

一九四四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晚上，有宪兵参加的巡查队到武江边沙滩上包围了赌场，实行捉赌。那些伤、病员却不怕这支有“兵王”的巡查队，于是开展了一方要抓人、一方

作反抗的“肉搏战”，巡查队和宪兵虽持有枪械，但不敢开枪，双方凭手脚“作战”。结果，经“肉搏”被巡查队捉到了两个赌钱的伤兵，而伤兵也抓住了两名宪兵。事发后，医院便派人去县政府商议并要求放回被抓伤兵，县政府则以理在手中，且有宪兵支持不肯放人。这晚，伤、病员房内，人语沸腾，伤兵头在煽动策划如何去将被捉的“弟兄”弄回来。

次日上午，从广同会馆涌出近两百多名伤兵，大部分手持铁钎、木棒、柴刀、扁担等物，连跛脚的也支着拐杖前来参“战”，气势凶涵地穿过大街，扑抵县政府，杨言要揪县长，吼叫立即放人。此时的梁汉耀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不敢露面，只得慌忙打电话去韶关向省政府报告。省政府答复着其“息事宁人”。县长无奈何派人与伤兵接触，进行谈判。伤兵一举得逞，气焰更高，提出两个条件：一，县政府要立即放人；二，要为被捉两伤兵赔偿名誉，沿路不停烧炮仗送返医院。县长害怕那些连省政府都不想得罪的伤兵，只好无条件答应。

是日下午，准备了炮仗，给两个捉来的伤兵肩披红布条，胸别大红花，派出人员挑炮仗和烧炮仗，霹霹啪啪地送伤兵回医院。那两个放出来的伤兵，在众人的拥簇下，有恃无恐，宛如战场上打了大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在密密的炮仗声中，慢慢地向医院方向踱步，慢得好似蜗牛移动，移动时又很注意炮仗声响得是疏是密，只要炮仗声稍疏，便停步不前。这下便慌了那班烧炮仗的，急忙拿起炮仗不停地烧。原先准备好的炮仗，眼看不够，立即报告派人到各商店买来，几间大商店的炮仗购买一空。县政府到广同会馆正常步行只需二十多分钟，伤兵却行了近个钟头。沿街百姓看到那个未曾见过的送人场面，倒觉得滑稽可笑。

伤、病兵闹完县政府后，对宪兵队仍不放过，说宪兵队与县政府勾结，定有不可告人的名堂，要宪兵队来“讲数口”（条件）才放那两个被抓进医院的宪兵。但宪兵队毕竟是“兵王”，不理伤兵那套，并放出说话，如伤兵要斗，就不客气搞到第七战区司令部去。伤兵自知赌博理短，搞到战区处理时自己站不住脚，要吃亏。到第三天，终于放了那两名宪兵。

五

一九四五年一月，日寇为了打通粤汉铁路，从南、北两路向韶关进犯。乐昌首当其冲，消息传来，人心惶惶。医院为了稳定情绪，不作会议传达应变方案，只在内部授意：如日寇打来，医院要转移到有利地方去，（那时国民党大凡吃了败仗，丢了国土，则说“我军已转移有利阵地”。）不论职员、军医、伤、病员，能随医院走的就轻装随行，不愿随医院转移的任由自择。个人如何应变，立时成了头等大事，不少人以为随院转移，前路茫茫，既无交通工具，又人多口众，行动缓慢，日寇追来，不是逃避不开被日寇打死，就会因人多弄不到吃的而饿死，倒不如自谋生路，还可赌点运气。不愿跟随医院转移的近百人。此时最惨的还是那些伤、病员，他们认为：随院转移，全靠徒步行走，还要背上被铺行李，体力怎能支持？与其半路掉队，或爬山越岭时累死在山头喂野兽，倒不如捧个钵头去乞食，尚有点希望返去自己的家乡。真是言者伤心，听者悽惻，幸而这时的伤、病员都能行动，不少已近康复，最后是大部分没随医院转移。

到二十一日，形势恶化，坪石陷落敌手。乐昌驻军自行

炸毁老虎头铁路桥。

翌晨，风声甚紧，医院撤出乐昌。路线原定先到韶关跟随兵站总监部转移，但因日寇已到马坝，总监部早已撤走，便改道直奔仁化。随院的职员、军医约八十多人，伤、病员近百人。医院物品，除药房人员带上少量较名贵药品，炊事员担上铁锅外，其余物件，全都弃置。人人打个背包，带上轻薄被盖和几件衣服，惶惶上路，狼狈万分。下午至仁化县的董塘。董塘驻有一个团的军队，为了探听情况，医院令暂停前行，将伤、病员安置在董塘，院员上山隐蔽休息。

将近傍晚，驻在董塘的军队派人告知，日寇今晚就会进犯董塘，该团已作转移，着医院速作打算。一个晴天霹雳，人们立时惊慌起来。医院一边在山上集合院员，一边派出两人下山去董塘关照那些伤、病员。派下山的两人中有一个是陈劲，去了一阵，山上突然听到“叭叭，叭叭”的日式枪声，大家顿觉不好，随见下山去看伤、病员的两人慌慌张张地回到山上来，说董塘附近发现日寇，日寇也发现了他们，刚才的枪声，就是埋伏在一个小山坡间十几个鬼子朝他们打的枪。陈劲腰间皮带被打穿了个洞，虽未伤及皮肉，但足已惊魂，故没法进董塘见那些伤、病员。听到这些，人人心头都似压上了千斤大石，但谁也没有出声，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董塘的伤、病员的遭遇必定惨绝人寰！院长随即下令向江西方向转移，这时已无一个随院的伤、病员了。

在去江西的途中，遇上兵站总监部，总监部叫医院到龙南暂驻听候消息。一路行去，饱一顿饿一顿，多数人身无分文，难得有人点上支烟，便会围来一班人，要轮流地一人吸上一口。辗转艰难，总算侥幸挨到了江西省的龙南，住在一间庙堂里，睡稻草地铺，天飘雪粒，衣单被薄，整天瑟缩。

后来找到了驻在龙南的总监部，发了工资，肚子也有糙米饭填饱，人们连日深锁的愁眉才得开展一下。

在龙南住了几个月，无事可做，人人苦闷，时局消息，无边无际，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后来传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初时大家对说惯了假话的国民党都半信半疑，后经在寻邬的七战区司令部证实，莫不拍手称庆，眼泪夺眶而出，欢喜到跳起来。官方消息向社会发布时，民众大放炮竹，团体大开晚会，唱歌跳舞，附近农村敲锣打鼓，放炮竹到天光。

光复后，一七七医院先回到韶关，后按总监部通知去老隆续继办军医院，到一九四六年初，取消一七七医院，大部分职员、军医回韶关编入第九军官总队收容，名为学习，实为办理退役手续，发给“胜利奖金”后，遣去。

XX

（上接第3页）只要提前几天送稿，稿子一到，三、四天内即可排印完毕，质量亦算不错。动委会便派专人将编好的稿件乘北上火车送去，等第三、四天即可将报纸带回。我就因为县府派我去采购茶油灯和订制警察冬天棉大衣到过耒阳，顺便做过一两次这样的送稿运报的工作。



乐昌抗日时期杂忆

梁伯彦

乐昌县立医院

抗战前，乐昌县已有一间所谓县立医院，但只有一名中医，一名仅具医士学历的西医和助产士二、三人，设备十分简陋。抗战初期，这里的儿童天花和成人疟疾非常流行。一九四〇年间，韶关、乐昌一带又出现过霍乱，由于缺医缺药，死人不少。这时正好遇到中山大学医学院由云南迁到乐昌县城复课，县长梁汉耀便商请该学院派出若干教授、讲师和高年级的学生为县民诊病。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有儿科专家张梦石教授、妇产科主任黎女士等人。张是兴梅人，解放后担任广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多年，又出任过广州医学院院长。黎主任在乐昌县城办过几期接产训练班，由各乡镇选派年轻女性前来受训，三个月一期，为推行新法接生起到一定的作用。又聘请该院的毕业生罗秉相为县医院医生，充实医疗力量。罗在解放后担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前几年才办理退休。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医学院院长李雨山夫妇均是留德医学博士，他们仅有一个几岁大的男孩，不知患什么病，在他夫妇料理下竟不治死去，葬在附城的小山岗上，知其事者无不引为笑谈。与县立医院并存的，还有

一间县救济院，因为经费无着，仅有救济之名，却没有开展什么实际工作。我记得当时的救济院院长是郭新，他是一个商人，在县城大街开设一间新新文具商店，算是当时最大的品种最多的文具用品商店了。

为省儿教院征购竹木

一九三八年，日军探知我军虚实，从惠州、博罗间的小路偷袭广州，国民党军队毫不抵抗，便于十月二十二日弃守广州，接着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海）番（禺）顺（德）等县相继沦陷，由于数日之间，失地千里，流落在广州街头和粤汉铁路沿线无人照顾的难童，到处都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国民党政府撤换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改派军人出身的李汉魂担任。按当时的官场习惯，李的夫人吴菊芳出任广东省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她接纳了一班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战时省会的韶关附近的莲塘（后迁黄岗）成立广东儿童教养院院本部，又在曲江的犁市设立一个分院，在连县设立四个分院，在南雄、仁化各设一个分院共七个分院来收容教养这些战时儿童。

单就设在曲江的院本部和分院来说，各占地一百几十亩之大，那时在战争期间，要在大块空地上建起这么多的办公室、课室和宿舍，只好不用砖瓦而用竹木为主要材料，架设一些临时性的建筑，人们称之为“竹织批荡”的东西。一则节省经费，二则建造时间较短，只要备好竹木，一两个月间，一百几十座的以杉树皮为顶、杂木为柱、竹篾为墙的建筑物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这些竹木材料从何而来呢？单靠曲江本地的出产供应不